

原轉走讀 ——從現場到教室的設計

原住民族の移行期正義の实地学習——現場から教室へ向かうカリキュラム設計
Guided Walking Tour Cours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for Indigenous Peoples:
Design From the Field to the Classroom

文・圖 | 李岱融 (國家教育研究院原民中心助理研究員)

事情是這樣開始的。

一場閒聊

原轉會時期，文資局與國教院分屬不同小組，彼此在會議上並不陌生，卻少有深入合作的機會。那時我對文資局的印象，多半來自他們在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、空間紀念與文化資產保存上的投入；而他們大概也知道，國教院和教育現場一直有著穩定的連結。

原轉會結束後，相關業務回歸各部會。一次會議後，我和文資局的廖健雄研究員聊到文化資產教育的推動困境：成果不少，卻不容易真正走進學校、進入課堂。當下我想到的，是不是國教院可以幫上一點忙？說得直白些，就是文資局有成果，國教院或許有一些通往學校的路。於是，故事就這樣開始了。



七腳川族人陳柏均講述當地部落地圖。

老師的期待

這個想法之所以很快成形，其實不是沒有原因。過去在原轉會歷史小組的訪談裡，我常聽到老師的焦慮：「我以前沒學過，怎麼教？」「原民議題這麼廣，我很怕講錯。」「我不是原民，真的可以教嗎？」這不是推託，而是真實

的不安。雖然108課綱之後，原住民族教育已成為重要議題，但真正能讓教師直接帶進課堂、尤其與重大歷史事件及文化資產有關的資源，依然不多。

我問老師，如果要讓你們教得更有把握，我們可以怎麼做？老師們的答案其實頗一

雖然108課綱之後，原住民族教育已成為重要議題，但真正能讓教師直接帶進課堂、尤其與重大歷史事件及文化資產有關的資源，依然不多。如果能走進部落、走進事件發生的地方，從族人的觀點、地方的視角重新去看那些歷史，也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



理解。他們說，再怎麼備課，都還是紙上談兵。論文太硬，資料太散，閱讀本身就花時間，更不要說數學、自然、生物這些關係較遠的學科。老師們說，如果能有人帶著他們走進部落、走進事件發生的地方，從族人的觀點、地方的視角重新去看那些歷史，也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



日智衡校長講述南庄事件。

我一直記著老師們的這個許願。所以，當健雄研究員提起合作的可能性時，這些話立刻就浮現在我腦海裡。

從小開始

所以，當健雄研究員提起合作的可能性時，我立刻想到老師們的話。一開始，我問他：文化資產範圍這麼大，可不可以先從小一點的地方開始？後來我們把焦點收斂到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。這一方面比較聚焦，一方面也能直接回應現場需求。

只是，這個「小」其實也只是相對的。因為文資局前期委託鄭安晞教授等人的計畫，整理出的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共有55個。從荷西、明清到日治時期，歷史縱深很長，事件彼此又互有牽連。當資料真

的攤在眼前時，我們只覺得：還能不能再小一點？

但既然答應了，也開始寫計畫了，就只能邊做邊找路。後來，整體方向慢慢清楚：先辦理文化資產教師培力工作坊，建立基本概念；再帶著老師進入兩天一夜的走讀課程暨課程開發工作坊；之後回到學校進行課程實踐與回饋；最後再把成果整理、分享、推廣出去。換句話說，這不只是一趟參訪，而是一個從增能、走讀、課程轉化到教學實踐的完整歷程。

走進現場

一年半裡，我們真的走了不少地方。我們走過國境之南的牡丹，也深入人止關更深處的霧社；在淺山地帶看日阿拐與洋商交易樟腦的舊址；在大



老師們在走讀課程中發問，也在課堂中實踐他們的教案。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化資產，不是只有社會科才能談。語文可以切入敘事、記憶與文學表述；公民可以談權利與制度；自然可以切入地景、生態與資源利用，甚至還有理化老師帶著同學蒸餾樟腦，再與歷史老師合作說明樟腦在日治時期的重要性。



豹社的土地上，看見衝突與殖民治理留下的痕跡；在七腳川族人的故事裡，重新理解縱谷鐵路背後並不光亮的代價。很多原本在紙本上看起來只是「事件」兩個字的東西，一旦人真的站到現場，理解就會開始改變。

我愈來愈確定，走讀最重要的地方，不在於「去過了」，而在於人一旦走到那個地方，原本抽象的知識會突然



春日國小高峰志老師觀課活動-用VR眼鏡，帶孩子到撒回兒部落。

長出空間感。你會知道，事件不是只發生在某一年、某一頁課本、某一段文字裡，而是發生在一條路、一座山、一條溪，一塊還有人居住、有人勞動、有人記得的土地上。

而且，走讀課程也不只有第一天的在地導覽。第二天，我們會邀請學者與族人，從不同角度補上事件背後的時代脈絡、族群觀點與文化意義，再進入小組討論與課程設計分享。這樣的安排，很像是在幫老師搭一座橋：第一天先用腳去走，用眼睛去看，用身體去感受；第二天再把那些感受慢慢轉成可以帶回課堂的教學語言。

帶回教室

對我而言，這個計畫最讓人高興的地方，不是辦成了幾場活動，而是老師真的

把東西帶回了課堂。老師們在走讀課程中發問，在隔日的研習裡發想，也在課堂中實踐他們的教案。慢慢地，我們也看見：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化資產，不是只有社會科才能談。語文可以切入敘事、記憶與文學表述；公民可以談權利與制度；自然可以切入地景、生態與資源利用，甚至還有理化老師帶著同學蒸餾樟腦，再與歷史老師合作說明樟腦在日治時期的重要性；另外在藝術、綜合活動與探究實作，也都有很好的著力點。

某種程度來說，這個計畫也像是幫我們自己補了幾堂台灣史的課。因為當你真的開始處理這些事情，會發現自己過去以為知道的，其實常常只是提要；而很多原



高俊宏老師帶領大豹社事件。

本不在主流敘事中央的位置，到了現地，反而變成理解整體歷史的重要入口。

細節與摸索

當然，事情並不總是浪漫的。真正的走讀從來不是把人帶去現場那麼簡單，而是一整套繁複的協作工程。一個看起來很有理想的計畫，最後能不能落地，常常不是靠理念，而是靠細節撐起來的。許多地點位處偏遠，路況、部落承载力、交通安全，都限制著參與人數。有些地方大客車進不去，只能改成幾台九人座分批上山。連一頓午餐，都得考量部落附近是否有意願協助、又能配合行政核銷的店家。但也正是在這些瑣碎裡，我們慢慢摸索出某種可能推廣的模式。很多事情，

都不是一開始就知道，而是在一次次執行中長出來的。

種子落下

感謝健雄研究員願意讓我們有足夠的空間，去把一個原本還有點模糊的想法慢慢長成計畫。也感謝陳濟民局長的支持，願意在我們一邊摸索、一邊前行的時候，繼續支持第二期的嘗試。這件事也讓我再次相信，跨部會合作如果不是停留在公文往返，而是真正以彼此的專業補位，其實可以長出

很不一樣的能量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愈來愈覺得，這個計畫真正珍貴的地方，不在於它辦了多少場，而在於它慢慢把一些看似距離很遠的人連了起來：研究者、行政人員、族人、在地文史工作者、第一線教師、教科書編輯，還有未來可能在課堂中接觸這些內容的學生。

如果說這一路走來，我有什麼最深的感受，大概就是：很多事情不是因為我們一開始就很有把握，所以才去做；而是因為現場有人真的在等，真的有需要，於是我們願意先跨出一步，邊做邊修，邊走邊學。老師們當年許下的願，並沒有停留在訪談紀錄裡，而是在幾次會議之後，慢慢變成了一條條真正走過的路。新年伊始，我們也接到了一些縣市的電話，詢問第一期走讀課程辦理的路線、課程與講師名單，這讓我相信，只要種子撒下，總會在某些地方慢慢發芽。

願「原」力與你同在。◆



李岱融

基隆市中山區人。1981年生。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博士。現任國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。曾任國教院原民中心博士後研究、輔仁大學兼任助理教授。從原住民族口傳文學收集入行，長期關注原住民族教育議題、對於師資培育、課程發展、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相關議題尤其投入。